

# 歷史記憶與創傷書寫： 論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 及其一九八〇年代小說的再現機制

羅詩雲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部助理教授

## 中文摘要

張光直（1931-2001）為知名考古人類學家，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先驅張我軍之子。1946年底他由北京返台，因「四六事件」牽連而入獄，釋放後投身人類學研究，赴美深造。戰後初期張光直曾於《新生報》發表數篇創作，直至一九八〇年代以「吳襄」為筆名發表小說，並著有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敘述早年生活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過程，補述了戰後台灣歷史的特殊階段。其戰後創作刻劃了戰時北京至戰後初期台灣的個人生命史，交織另面的時代紀錄與創傷記憶。本文以張光直的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及其一九八〇年代小說為討論核心，輔以戰後初期作家的小说與雜文，呈現流離於中國、台灣、美國三地的台灣知識分子之歷史記憶與創傷書寫。結構上，首先整理戰後初期社會狀態與張光直的生命經歷，次節析論《蕃薯人的故事》關於戰時北京與戰後台灣戒嚴前的記述，包括戰時生活、二二八與四六事件的創傷經驗；再者，以一九八〇年代小說對比作家回憶錄，剖析生命記憶與文學再現間的互文重編，思索創傷書寫如何挪轉為有意義的文化批判和自我療癒。藉由張光直的書寫不僅得以銜接

斷裂的國族歷史，且能掌握戰後初期的台人心靈圖像，而具返觀台灣社會的省思意義。

關鍵詞：戰後初期、張光直、四六事件、歷史記憶、創傷書寫

**Historical Memory and Traumatic Writing:  
Kwang-chih Chang's *The Story  
of A Taiwanese Man*  
and Representation Mechanism  
of Chang's Novels in the 1980s**

Lo, Shih-Yun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Kwang-chih Chang was a renowned archaeologist and anthropologist and also the son of Wo-chun Chang, a pioneer of Taiwan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Kwang-chih Chang returned to Taiwan from Beijing in the end of 1946 and was later sent to prison because of his involvement in the April 6th incident. After he was released from the prison,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anthropology research and carried out a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published several works in *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ostwar period and had been publishing novels under the pseudonym of Hsiang Wu until the 1980s. His memoir *The Story of A Taiwanese Man* describes his early life, how he ended up in prison because of the

April 6th incident, and the unique postwar history of Taiwan. His postwar works portray his life history in Beijing during the war and in Taiwan after the war, intertwined with the documentation and traumatic memories of the generation. According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ang's memoir *The Story of A Taiwanese Man* and his novels published in the 1980s, with supplementary discussion on novels and essays of other autho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ostwar period,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traumatic writing of this Taiwanese man wandering among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first demonstrates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ostwar period and Chang's life experiences. It continues by discussing descriptions in *The Story of A Taiwanese Man* about the situations in Beijing during wartime and in Taiwan from after the war to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including his traumatic experience in wartime life,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nd the April 6th incident. By comparing this memoir with his novels in the 1980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d reorganization of Chang's life memory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to reflect on how traumatic writing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meaningful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elf-healing. With Chang's writing,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reshape the nation's fractured history and more importantly grasps the mental images of Taiwanese peopl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retrospective reflection on the Taiwanese society then.

**Key words:**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Kwang-chih Chang, April 6th incident, Historical memory, Traumatic writing

# 歷史記憶與創傷書寫： 論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 及其一九八〇年代小說的 再現機制

## 一、前言：戰後台灣與張光直

1945年終戰對台灣而言是近代國民意識於一九二〇年代逐漸形成，且脫離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後，於短時間內進行「國民化」(nationalization)的關鍵歷史階段；然而此國民統合的過程卻於戰後初期遭受嚴重的挫敗與分裂<sup>1</sup>。所謂的「戰後初期」(1945-1949)從不同歷史、國家觀點考察自會有不同意義，個人也會有相異的體驗，例如1945至1949年的時間段限會有「戰後初期」和「民國末期」之別<sup>2</sup>；又若言戰後台灣歷史發展包含了中華民國史和日本殖民統治史的結構影響，那麼「戰後初期」即是這兩股歷史文化遺產以Y字型合流、碰撞以開

---

<sup>1</sup>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年)，頁16-17。戰後初期指的是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至1949年12月國共內戰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戰敗撤退至台灣為止的期間。以行政組織劃分，1945至1947年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1947至1949年為台灣省政府時期。戰後至二二八事件之前台灣雜誌的發行狀況，民間或進步文化人主導的刊物競相出版，思想言論也較官方性質報刊來得成熟。參見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新北：稻鄉，2007年)，頁154-155。

<sup>2</sup> 此處指由台灣史、中國史觀點而論，參見許毓良，〈緒論〉，《台灣在民國：1945~1949年中國大陸期刊與雜誌的台灣報導》(台北：前衛，2018年)，頁26。

創新局的階段<sup>3</sup>；以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發展而言，此間則是一段左／右、中／台、官／民各持不同立場人士相互競逐的文化過渡期<sup>4</sup>。上述視角顯示戰後初期中國與台灣社會各層面的互動交涉，以及「戰後初期」對戰後台灣文化秩序生成與重構的研究意義與討論價值。

張光直（1931-2001）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先驅張我軍（1902-1955）之子，1946年12月隨母親由北京返回台灣，並進入建國中學就讀，經歷過二二八的洗禮，其後又因「四六事件」的牽連而入獄近一年。戰後初期入獄經歷以及少年時閱讀父親所譯西村真次之《人類學泛論》與建中時的閱讀經驗，而孕育對人類考古領域的興趣和學養<sup>5</sup>；文學活動方面，戰後初期張光直曾使用張植、張小生、何無感等筆名，於發行量最大的全國性報紙《新生報》發表數篇小說、雜文後沉寂許久。直至一九八〇年代之初以「吳襄」為筆名，於波士頓旅美華人刊物《秋水》發表小說〈楊老師〉（1982年第11期）、〈孫在芳〉（1982年第11期）、〈王恢和李繼禹〉（1983年第12期）等篇<sup>6</sup>，後於短暫返台期間著述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於1998年出版<sup>7</sup>。《蕃薯人的故事》敘述了張光直早年於

<sup>3</sup> 呂芳上，〈二戰後台灣社會的搥成：Y字型共創論的一個解脫〉，收於謝政論等編，《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台北：允晨，2015年），頁11-12。呂芳上認為Y字型共創論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正顯示了政治、文化轉型的陣痛。

<sup>4</sup> 崔末順，〈「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1期（2015年10月），頁42-44。

<sup>5</sup> 張我軍藏書對張光直的影響，參見臧振華，〈張光直生平事略〉，《古今論衡》第6期（2001年6月），頁106；李永迪，〈與張光直先生談夏文化考古〉，收於三聯書店編，《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北京：三聯，2002年），頁179：「我上小學的時候便讀了《古史辨》。那時我睡在我父親的書房裡，書架上有一套《古史辨》，我便拿來翻閱。當時覺得很有意思，把整套《古史辨》幾乎都看完了。這樣《古史辨》對我也起了很大的影響。現在我總是不信古書，對古史總是先持懷疑的態度。」；高友德、劉益昌、陳其南，〈鋤頭下的學問：初訪張光直〉，《當代》第16期（1987年8月），頁92：「後來到台灣念中學，看見商務印書館出的《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裴文中先生寫的。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本用中文寫的考古學書，一九四八年出版，裴先生總結了過去的考古學的結果……這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sup>6</sup> 《秋水》為1975年創辦的海外華文文藝季刊，為海外華人作家與中國作家的交流園地，主編為旅美華人學者及小說家木令耆。木令耆原名劉年玲，原籍湖北，生長於上海、南京、重慶等地，1947年離開中國赴美求學、定居，曾為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翁奕波，〈異鄉人變奏曲——木令耆小說創作簡論〉，《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2年7月），頁41。

<sup>7</sup> 張光直因為帕金森氏症之故，著述方式以口述、他人執筆方式完成《蕃薯人的故事》。何標（張光正），《明月多應在故鄉》（台北：海峽學術，2008年），頁66：「1997年1月光直出院後，在台北市和平東路租房靜養，由他口述請人記錄，開始撰寫《蕃薯人的故事》，

北京的生活回憶與終戰後的台灣景況、個人經歷，然大半篇幅仍著筆於因四六事件的入獄過程，補述了戰後台灣歷史的特殊階段。回憶錄後併有附錄一、二、三，內容為羅鐵鷹（1917-1985，筆名駱駝英）與其子羅鳴於一九八〇年代的信件，以及建中時期的小說、雜文創作。由此回憶錄的記述時間、張光直終戰前後的經歷與再創作時點，可視張光直及其文本為考察「戰後初期」與「戰後台灣」的重要角度及素材。

歷史的本質關乎記憶，記憶本身與社會生活密不可分，透過集體的共同回顧與創造得以形成。日記、自傳、傳記、回憶錄與戰後回溯戰時生活的文學文本和口述紀錄，提供豐富的生活史或文化史的線索。王明珂指出日記、回憶錄、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等新史料的呈現，得證記憶是部分大眾一種「選擇性的過去」<sup>8</sup>。上述史料所記之「過去」的結合討論，進一步能以「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間的橋樑關係建立研究連結。回憶錄、自傳、人物傳記作為記載個人「過去」的文學形式，更複雜者為此種文類的「自我呈現」問題，一旦出版即成為社會記憶重建歷史的一部分。易言之，人物傳記、自傳、口述歷史等文本於「過去事實」、「社會記憶」、「社會道德與公平正義」等三層次具有分析價值，藉由「過去」的意義了解人類及其時代社會本質、文化價值與認同結構<sup>9</sup>。木令耆評述張光直創作：「他的〈小人物的速寫〉及《蕃薯人的故事》都是描述一般居民的切身痛害，受害的原因莫非是國家社會的動盪。」<sup>10</sup>張光直友人孫康宜更論《蕃薯人的故事》具有描寫人類複雜性與尊嚴性的超越性意義與感動<sup>11</sup>。由此，從社會記憶的角度看待《蕃薯人的故事》與文學創作所記之「過去」，包括張光直對北京旅居生活與戰後返台的離散經驗和敘事書寫，乃為於各式源自人的記憶之資料得到社會價值框架的共相。是故，由戰時旅中生活、二二八與四六事件之個人經驗的選擇、組合及再現，不僅得以銜接戰後斷裂的國族歷史，亦能掌握經歷戰後初期台人的精神結構。

---

同年6月書稿完成，寄給我徵求意見。」

<sup>8</sup>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卷3期（1996年9月），頁148。

<sup>9</sup> 同註8，頁178。

<sup>10</sup> 木令耆，〈再讀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二十一世紀》第71期（2002年6月），頁118。

<sup>11</sup> 孫康宜，〈張我軍、張光直和我們家〉，《走出白色恐怖》（台北：允晨，2007年），頁18。

先行研究方面，就本文議題可分為張光直、四六事件兩大脈絡。因為張光直是知名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關於他的直接研究概為考古學成就研討與生平介紹、訪談，包括國史館編〈張光直先生事略〉、臧振華〈張光直生平事略〉，以及高友德、劉益昌、陳其南〈鋤頭下的學問：初訪張光直〉等文。與本文文本關聯者，則有木令耆〈再讀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江玉林〈人、法的主體與法律的考古：從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也談法律的故事〉二文。前者剖析了《蕃薯人的故事》呈現白色恐怖的寫作背景與時代意義，後者提出張光直對回憶錄的處理是對自我記憶的考古，表現人與文化塑造之間關係的重建及分析，尤其是透露中國文化圈內對人的分類與語彙、刻板印象<sup>12</sup>；至於四六事件的研究成果為兩大性質，一為四六事件相關學生口述訪問的出版專書，如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臺大部分）》、《台灣學運報告 1945-1949》等系列書；二為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陳翠蓮與李鎧揚合著《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等研究<sup>13</sup>。以上研究皆有助於掌握張光直生存的社會背景與校園情勢，以及入獄後的人際網絡與景況。

論述架構上，首先整理戰後初期社會狀態與張光直的生命經歷，次節析論《蕃薯人的故事》關於戰時北京與戰後台灣戒嚴前的記述，包括戰時生活、二二八與四六事件的創傷經驗；再者，以作家一九八〇年代的小說對比回憶錄，剖析生命記憶與文學再現間的互文重編，思索創傷書寫如何挪轉為有意義的文化批判和自我療癒。回憶錄雖晚於小說於九〇年代方成書發行，但就考察張光直的生平經歷和小說取材之角度，論述次序乃置小說研討之前。任何詮釋「過去」的歷史處境本身就是一種觀點、一種視線或視域的呈現。張光直的回憶錄、

<sup>12</sup> 江玉林，〈人、法的主體與法律的考古：從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也談法律的故事〉，《月旦法學教室》第12期（2003年10月），頁110-120。

<sup>13</sup>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台中：晨星，2000年）；藍博洲，《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臺大部分）》（台中：晨星，2001年）；藍博洲，《台灣學運報告 1945-1949》（台北：印刻，2015年）；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11年12月），頁17-41；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臺大歷史學報》第62期（2018年12月），頁213-265；陳翠蓮、李鎧揚，《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台北：台灣大學，2017年）。

小說創作不僅表現了戰後初期台灣「國族」建構的歷史過程及其所蘊含的矛盾與衝突，且能掌握經歷戰後初期的台人心靈圖像，而具返觀台灣社會的歷史意涵和省視意義。

## 二、歷史記憶與創傷展演：《蕃薯人的故事》與戰後初期小說、雜文

回憶錄是一種別具價值的史記，以個人名義撰寫、重視作者的親歷，而不囿於正史的客觀、全面、體系式的規範，寫作上也帶有明確的個人風格和歷史見證價值。《蕃薯人的故事》為張光直 1998 年出版的回憶錄，書名副標為「張光直早年生活的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記」，作者於記述中加入了思考個人、台灣社會、命運和歷史的省思片段。也因作者的考古人類學背景，頗有對戰後初期文化與環境重建與分析的意味。鑒此，本節將就回憶錄與戰後初期創作所述之台灣社會生活與政治事件進行討論：

### （一）早年生活與身分認同

#### 1、北京與台灣的距離

《蕃薯人的故事》內容分為十四節，章節之首〈芋仔與蕃薯〉陳述了自我認同和語言使用問題。次節〈父親、母親和他們的朋友們〉詳述父母張我軍、羅心鄉（羅文淑）的身家背景，特別是大家庭組織中親友關係的人際梳理；另洪炎秋及其夫人關國藩與張我軍夫婦的交情也寫於此節。至於回憶錄的結構方面，早年生活、返台之初與建中求學可為前半部記敘重點，後半則著筆於四六事件的入獄經歷。最末〈後記〉一節則道出回憶錄口述出版的原因與生命影響：

我在這裡寫下來的這些瑣事，在心裡記憶了近五十年，沒有更早寫下來，是考慮到有關人的隱私權問題。現在事過景遷，訪舊半為鬼，再不寫，恐怕這一小段歷史就沒有人記得了，……常常有人問我：這一年牢

獄之災對你有什麼影響？我想它影響了我一生做人的態度。在那個環境裡，人的「好」與「壞」是很難判斷的。<sup>14</sup>

懷舊是自然的個人情緒與社會行為，現在的性格、情緒、言談隱然為往昔事物所型塑，對未來的想像也是過去記憶的感召，可以說人是活在過去的記憶中<sup>15</sup>。故前文提及四六事件的入獄經歷是使張光直對人類考古學產生興趣的原因之一，「人」成為他終其一生探究的課題，而這樣的文化意識深切影響《蕃薯人的故事》的行文組織。〈後記〉也表露張光直所意識的讀者群，他的對象意識首先含括回憶錄出現的親友師長、四六事件的受難者、麥浪歌詠隊成員等人物。因此，心理上希望此書出版徵得他們的同意，並提出敘事細節上難免出錯的但書，希望「讀者」不吝校正；此寫作動機呼應其戰後隨筆〈文學是為多數不幸者存在〉，闡述文學書寫的意義為暴露黑暗、昭示光明<sup>16</sup>。然冒著風險也堅持寫下過往記憶，正為了記錄引文所述的「這一小段歷史」——在國際秩序重整中的戰後初期台灣，益見這段時期對張光直和台灣人的意義。

出生、成長於北京的張光直在北京城生活了十五年才隨父母回到台灣，經歷了戰後台灣政經局勢混亂、社會動盪不安的歷史階段<sup>17</sup>。但在生命經歷的章節紀錄之前，作者先由自我的身分認同談起，顯見其扣緊「人」的問題之寫作定位：

我們從小學會不喜歡日本人，雖然學了六年日文，但是日文只能看，不能說，也不能寫。我們自己認為毫無疑問地是台灣人，是蕃薯人，但也是閩南人（福建省南靖縣）、中國人。

<sup>14</sup>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的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記》（台北：聯經，1998年），頁105-107。

<sup>15</sup> 陳平原，〈序一 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收於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頁9-10。

<sup>16</sup> 參見同註14，頁152-153：「矛盾的、高爾基的……。尤其接近若干精彩的散文、詩、戲劇，以至於時代里程碑似的傑作，儒家、吶喊、子夜等。從那些書裡，我發見文學偉大的意義，文學是為了多數不幸者而存在的，它一方面要暴露黑暗，一方面也要昭示光明。」

<sup>17</sup> 戰時於北京活動的台人身分多為文化、經濟、醫療相關人士，個人或組織連結性緊密。戰後北京的台灣人有的準備回台，也有人滯留北京遭遇到其後反右運動及文革的迫害，如江文也、柯政和、張秋海。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卷1期（2008年4月），頁43-49、61。

現在的台灣人也自稱「蕃薯」，但是有一個新名詞加入了族群語彙，那就是「芋仔」，是指一九四五年以後來的外省人。……芋仔和蕃薯現在被人工性的界定為兩個刻板印象：芋仔不說台語，不與台灣認同，也痛恨日本人；蕃薯人說台語，本土性強，對日本人有親切感。（《蕃薯人的故事》，頁3）

終戰後台灣人面臨的景況是如何與新國家取得良性互動，並非建構本土的獨立政治權威，終戰的歷史結構制約了台灣人的國家認同<sup>18</sup>。戰後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肯定，也經常作為文化議題討論的前提<sup>19</sup>。然張光直的回憶錄於戰後初期的時代背景下，明顯存有一個混雜重層的身分認同定位之敘事基調：生於北京的他自認有台灣人、蕃薯人、閩南人、中國人的主體身分，戰後所謂蕃薯、芋仔之分並不能截然劃分張光直一家人：「我們一家人用新的語彙就無法分類。」（《蕃薯人的故事》，頁3）。張光直清楚意識到這些「新的語彙」（芋仔、蕃薯）的使用脈絡與特性，在台灣國族歷史的發展下象徵意義是流動且相對變化的，同時呈現「民族」建構下次級範疇「族群」與「省籍」關係折衝與群我範疇區別。

此外，回憶錄也見作家對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後於國族身分上徬徨無措的觀察：「剛光復時，他們也嘗試作中國人，但是當時從大陸上來的『模範人物』（role models）太差，叫人不能尊敬，這批台人便無所適從。」（《蕃薯人的故事》，頁30）。島內外的台灣人面對終戰的劇變產生了自我定位的問題，尤其在族群觀念不斷改變的一九四〇年代之後，身分認同並非能簡單辨明。張光直的回憶錄透過戰後省籍隔閡距離的紀錄、二二八事件流血現場與四六事件入獄的親身經歷，架構出中國與台灣認同疊合的衝突及內在崩解。且由建中生活的左

<sup>18</sup> 吳叡人，〈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收於蕭阿勤、汪宏倫等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16年），頁44。

<sup>19</sup> 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重建與「去日本化」、「中國化」問題相關，因此文化的行為主體及內容形式問題被集中探討，包括強調台灣人的民族精神以爭取台灣建設主導權、由日本影響找到進行台灣中國化的切口、追求民主價值的中國化等論述。參見崔未順，〈「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1期，頁44-58。

翼活動和同時期具有社會改造意識的散文創作，更顯明張光直對二二八事件後官方全面控制台灣歷史詮釋與文化論述的反動性。回憶錄寫作時間的 1997 至 1998 年，恰為張光直 1994 年回台擔任中研院副院長卻因健康因素辭任之際，回憶錄的起筆應是觸發自長期旅美的他一面迎接疾病挑戰，一面定居台灣的數年生活，故回首省視活躍的青年生涯與初見的動盪台灣社會。

人類考古學識背景使然，張光直的回憶錄透過各種物質層面與歷史痕跡探索關於自我的過往，關係是如何建立、鞏固、斷裂及再重建。故張光直的回憶錄對父母家世系譜以及父母婚戀過程的關係脈絡，進行了詳細敘述；北京生活方面，由張光直兄長張光正的著述可知，張我軍一家於北京居所為四合院形式，二十多年先後落腳宣武門外永光寺中街 9 號（現為永光寺東街 34 號）、西單察院胡同 47 號（現為 10 號）、西單察院胡同 5 號（現為 7 號）、西單手帕胡同丙 25 號（現為 75 號）四處<sup>20</sup>。區域劃分上四處為現今北京西城區，此區文化蘊含豐富、名勝古蹟眾多。回憶錄亦出現過廠甸、琉璃廠、西單和東安市場等地的描述，張光直小學時家人方搬至手帕胡同，與洪炎秋為鄰。〈北京的生活〉作者以步行時間描述北京城幅員之廣，由空間、飲食、節慶定位北京生活的記憶：「北京人多半住在城裡，在我小的時候，我一天的生活被一個巨大的建築物所支配，那就是北京的城牆。……我在城裡面的活動，是由城牆和城門所規範的。」（《蕃薯人的故事》，頁 15）。北京城牆是張光直對北京生活的記憶點之一，也會走上被鐵絲網圍繞禁止攀爬的城牆一覽景色。鐵絲網纏繞的城牆成為中、日民族對峙的地域分界，此際北京為日本帝國勢力範圍，回憶錄也見對八路軍和日軍衝突對峙的描述，以及來自解放區的左翼書刊；而作家的北京記憶也停留在赤化的政治環境與波折的戰時變化。

<sup>20</sup> 張光正，〈悲、歡、離、聚話我家——一個臺灣人家庭的故事〉，《番薯藤繫兩岸情》（台北：海峽學術，2003 年），頁 11-13。由張光正的敘述可推判張家居住時間，約自 1926 年 6 月至 1929 年住於宣武門外永光寺中街 9 號，1929 至 1934 年住於西單察院胡同 47 號，1934 至 1936 年住於西單察院胡同 5 號，1936 至 1946 年底返台的十年間住於西單手帕胡同丙 25 號。

戰後台灣人返台的隱性與顯性脈絡，可考察出戰後中國情勢動盪、欲貢獻中國與台灣之間社會事務、思鄉情切等原因<sup>21</sup>。相對於此，「返台」卻非張光直所規劃的，乃因身體和家庭因素而不得不隨母親由天津搭乘民眾輪貨輪返台。三個月的航旅中委身船艙餐廳，同船者大多為外省人，搭乘者眾多。初次踏上台灣土地的張光直，第一印象是基隆碼頭上民眾乾淨的衣著和台灣話、樹景。乘卡車至台北的路上，混雜著西洋式、紅磚瓦、日式等建築沿景又是另一番風情：

一路我看到台灣的建築有三種，一種是西洋式的，和北京的沒什麼分別；一種是紅磚蓋的農村房子，和北京的完全不一樣，屋頂兩邊翹起來，但天已經黑了，看不太清楚；最後一種是日本式的房子。（《蕃薯人的故事》，頁 29）

由行文可見返台之初作家對台灣故土認知的理解與表現，主要建立在與前期青少年北京經驗的對比，嘗試構築他所未知的原鄉圖景。對於抵台後板橋居所的文字建構，與北京的描述一樣由空間、街道定位，再輔以描述生活的在地細節。值得注意的是，張光直對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台灣以及內外省人群體的衝突之紀錄，顯現了作者與台灣本土的文化距離：

這個芝麻大的小官，對他自己的地位非常重視。他一年到頭穿著一件筆挺的日式制服，腰間配著一把黃澄澄、亮晶晶的劍。……在列車過站，兩人錯過的那一瞬間，兩人同時立正敬禮。我們兄弟都笑他們將自己的那點小地位看得太嚴重了，可是父親說他們也把自己的責任看得同樣嚴重，所以台灣列車很少誤點的現象。（《蕃薯人的故事》，頁 32-33）

對於從未在台灣生活的張光直兄弟而言，台灣的生活經驗一切顯得新奇。站長、列車長日式風格的嚴謹舉止、工作流程和筆挺穿著都顯特殊、不符他們在中國

<sup>21</sup> 羅詩雲，〈擬聲政治：論戰後初期《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淡江中文學報》第 41 期（2019 年 12 月），頁 219-224。

所見的日常印象，覺得過於小題大作而可笑；但具有日治經驗的張我軍則以正向的角度評價其效率，顯現兩個世代台灣人歧異的觀點與生長風土。

然而戰後生活的文化感知上，實屬語言的衝擊最大，這背後其實影射出台灣國族統合的省籍矛盾問題。不單是日語、國語的混雜交談狀況，張光直另留意到外省人濃厚的地方口音以及各省方言的使用，顯示外省人群體內部結構亦有所不同。不僅本省人、外省人群體由內（語言）到外（服裝）都有一定距離的差異，兩者的日常接觸也時見矛盾，張光直描述外省人將本省人視為日本人，而帶有征服者的優越感。這種感受興發的背景來自本省人與外省人活在殖民、冷戰交錯的歷史結構狀態，以對日本想像之落差為衝突產生的情緒基礎<sup>22</sup>。這種新國家建構現實中的省籍隔閡與戰後台灣不穩定的社會也引發張光直對北京的追念，雜文〈故鄉（外二章）〉明顯以北京作為敘事對象，抒發對北國風物的遙想及依戀：

我終日沉醉在北國刺人的風、美麗的雪、一望無垠的平原、參天的古柏、可口的麵食、摩肩接踵的廟會、低聲下氣向生活的屈服者的集會——天橋、一個個淳樸的臉……。以及這些景象聯合起來的一幅北國風情畫的回憶中……。但是我把戰火瀰漫，充滿嘶喊、呻吟、哭嚎和槍砲聲的北國忘記了！什麼時候才能重新踏上那黃色的土？（《蕃薯人的故事》，頁143）

1948年1月發表的〈故鄉（外二章）〉道出北國風情令人陶醉且惆悵的心境，見出甫隨家人返台的作家仍心繫北京，卻因為戰火無法重返黃土故園。思念青春故土的心情與省籍隔閡的感受交雜，且持續發酵於張光直的建中求學階段，師生、同學間使用日語交談的情況催化自己孤立的寂寥處境，突顯戰後初期慣於北京生活的作家主體與父土台灣之間的心理距離。

<sup>22</sup> 陳光興，〈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2001年9月），頁81-88。

## 2、二二八與校園生活的啟蒙

二二八事件是戰後台灣後殖民體制矛盾下的結果，也是政治、社會層次等內部矛盾在台灣固定下來的重要事件，就此改寫了台灣人的心理地圖<sup>23</sup>。二二八對甫回台的張光直而言影響甚深，事件的發生時值作者建中就讀之際，《蕃薯人的故事》以機關槍聲響導入事件的發生，敘述目睹同學遭受暴行的過程：

我穿的是表哥阿安的日本軍裝，顯然是個台灣人。……拳頭集中在韋一個人身上，而韋穿的是一深灰色中山裝（標準到四個中山袋），所以即使是個傻瓜也想得到今天要倒霉的是外省人。……這時的台北我是非常不熟悉的。到那裡去？我的友伴血流滿面，當然第一件事是到醫院去，……我因為會說台語，有恃無恐便大說特說，向路人解釋我的朋友是被三個暴徒打成這樣的。（《蕃薯人的故事》，頁 40-41）

回憶錄中張光直因為服裝、語言而逃過本省人的毆打，並運用講台語一路掩護受傷的外省同學就醫。然而就連醫院門口也見台灣人暴打外省人的景況，醫院內滿是受傷的外省人，讓驚懼不已的張光直只得向學校師長反應。二二八時就讀建中三年級且經歷四六事件的烏蔚庭，也與張光直一樣目睹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暴力，外省人的他選擇於同學家避禍<sup>24</sup>。張光直雖是台灣本省人，卻也產生畏懼而擔憂生命安全的情緒，因為環境的不熟悉與語言腔調問題，讓他改道至姑母家觀察情勢再做打算。事件過程張光直的感官和心理感知極其敏銳、警覺，包括臨時決定至姑母家避難沿途所聽到的槍響，以及好幾日透過無線電廣播掌握外界情況，字裡行間表現二二八事件對當時台灣人民的深刻影響。

張光直經歷的二二八是血腥且充滿暴力的，甚至牽連自己認識的親友。若承接張光直返台生活後所感受的省籍隔閡氛圍，回憶錄中二二八的重述顯現戰後初期台灣社會不安實態，亦表露對自幼以來養成的國族認同之衝擊，自認是

<sup>23</sup> 後殖民體制矛盾包括政治上的反國民黨意識，社會上則為本省與外省的省籍矛盾。丸川哲史著，朱惠足譯，〈與殖民地記憶／亡魂之搏鬥——台灣的後殖民心理地圖〉，《中外文學》31卷10期（2003年3月），頁35-36。

<sup>24</sup> 周馥儀、李鎧揚訪談，李鎧揚記錄，〈附錄 壹、烏蔚庭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陳翠蓮、李鎧揚，《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台北：台灣大學，2017年），頁214-215。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張光直面對族群情感走向分裂的現實。特別的是，張光直回憶錄中的二二八多敘述的是外省人被暴力相向的歷史現場，以及具有台灣人身分認同的自己置身此現場中的恐懼。同時隱約顯露自幼成長於北京，父親為本省人、母親為外省人的張光直，其於二二八事件中的尷尬處境，此可見於下述情節描寫：

同時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台籍婦女，穿短衣，很整齊，像是上班族的樣子。她過來把韋君接過去，一面小聲用國語跟我講：「跟我走，不要說話！」……她趕緊說：「不要說話，不要說話。」等到我們走進門口，她才離開我們。（後來我想我的台語有北京味，她恐怕我話說多了人家會聽出來，所以教我不要說話。我如何謝謝她？）（《蕃薯人的故事》，頁 41-42）

一路講台語護送友人就醫的張光直有恃無恐，卻不自覺在前往醫院的路上引人注目，一個年輕孩子與台籍婦人已注意到他奇特的台語腔調。台籍婦人以國語提醒講台語的張光直，此部分一則呈現安然抵達醫院的張光直在其提醒下始驚覺自身險境的後知後覺，一則道出二二八衝突中本省人對外省人施以援手的情形。

1994 年回台任職的張光直迎來台灣此際族群政治衝突加溫的社會環境，《蕃薯人的故事》的二二八敘事可謂回應了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風潮，重新省思省籍族群產生隔閡的戰後初期原點<sup>25</sup>。二二八不僅催化了白色恐怖的出現，也催化了張光直與台灣歷史傷痕的文化記憶與認同連結，《蕃薯人的故事》的歷史現場提醒了後人必須由台灣族群政治的社會脈絡，予以理解民族意識形成的歷史與政治過程。車站站崗的士兵、行李檢查和外省人應對舉止的改變，張光直的回憶錄提供了戰後初期此一特殊時代的社會景況，且反映

<sup>25</sup> 一九九〇年代國家認同爭議成為台灣社會最重要的政治分歧之一，國家定位議題在當時不同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競爭下不斷討論，其效應尤其顯現於 1994 年底省市長選舉中以國家認同為動員重點的情緒與現象。王甫昌認為前述衝突或對立是不同族群意識型態陣營以民族主義為名的族群競爭，這些抗爭具有強烈族群意涵，不能完全以典型的民族主義折論之。參見王甫昌，〈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臺灣的族群政治〉，《臺灣社會學研究》第 2 期（1998 年 7 月），頁 2-3、18-21。

個人的認同、行為、記憶與社會關係間的動態結構。個人所建構的生命敘事，通常涉及某種更大的集體公共敘事。於張光直的例子中，便是牽涉了戰後台灣政治壓迫的二二八與四六事件，更龐大的敘事詮釋框架則是台灣人的國族認同與族群政治問題。

在社會氛圍如此詭譎、時局愈趨緊張的高中階段，1947年避禍來台的文藝評論家羅鐵鷹（原名羅樹藩，筆名駱駝英，《蕃薯人的故事》稱其為羅剛）為張光直啟發了文藝創作與左翼思想的道路，引介《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靜靜的頓河》、《紅星下的中國》等翻譯小說<sup>26</sup>。1947至1948年兩人互動密切、關係融洽，尤於文學理論與創作討論上予張光直諸多啟發：

我們常常下午下課以後，一起集中在羅老師的屋子談文學。有時候還有他的朋友加入我們，現在記得名字的有一個雷石榆，他是個劇作家，雷太太叫蔡瑞月，是舞蹈家。……我們也用新生報的「橋」來做發表的媒介，比如羅老師就用一個筆名發表了一篇文章，將中國新文學在台灣應該採取的形式，詳細的寫出來。不久他就受到攻擊，……我也加入了這個辯論，用「何無感」的筆名寫一篇文章來為羅老師辯護，攻擊筆名叫「陳百感」的一個作者所寫的一篇文章。（《蕃薯人的故事》，頁50）

羅鐵鷹逃亡後於一九八〇年代曾與張光直書信來往，張光直甚至參與了戰後《新生報》副刊《橋》的文學論爭，為羅鐵鷹申辯撰述〈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sup>27</sup>提出台灣特殊性與中國一般性的融合問題，不以台灣文學的特殊性為滿足。不單是文藝評論家羅鐵鷹、詩人雷石榆的引導，專業廣播人崔小萍也曾指導張光直高中時的諷刺話劇〈欽差大臣〉的演出，於報紙獲得好評。此外，作家與同學合編左傾色彩刊物《五十年代》，並於《新生報》副刊發表具社會批判意味的

<sup>26</sup> 羅鐵鷹與1946年4月赴台的友人雷石榆取得聯繫，於1947年秋冬由香港抵達台灣，於建國中學任職國文教師，期間曾入住木刻藝術家黃榮燦家裡。1948年7、8月以筆名駱駝英參與《橋》副刊文學論戰，1949年春感於國民政府展開社會整肅，自基隆乘船逃至上海再入江蘇，活躍於文藝陣線。羅鐵鷹生平事蹟與在台活動，參見許南村，〈「兵士」駱駝英的腳蹤〉，收於曾健民編，《噤啞的論爭》（台北：人間，1999年），頁65-73。

<sup>27</sup> 何無感（張光直），〈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台灣新生報》，1948年8月25日，第4版。

小說〈老兵的佛像〉<sup>28</sup>、〈伐檀〉<sup>29</sup>。然而上述藝文活動的參與和親友影響，讓張光直被視為具有左翼色彩而受到學校訓育人員和保安單位的注意，成為郵政檢查的黑名單<sup>30</sup>。

小說〈老兵的佛像〉以八一三事變、台灣接收、國共內戰等事件串接時序，藉外省老兵的隨身佛像帶出戰爭中可貴的人性，鄙夷老兵而於一旁談笑的大學生則呈現未經世事、常享安逸的世人形象。〈伐檀〉的寫作則受國文老師駱駝英影響，多了分批判資本家剝削勞工的階級意念；此時期描寫校園生活的雜文，除〈故鄉（外二章）〉明顯以北京作為懷念對象外，〈學校生活散記〉、〈建中風景線〉、〈文學是為多數不幸者存在〉都描述了建中生活。張光直描繪校園淪於考試而缺乏知識追求的暮氣，〈學校生活散記〉最末引述魯迅《狂人日記》救救孩子的用語，表現去除封建體制以行社會改造的精神呼告。〈建中風景線〉結構、內容同〈學校生活散記〉的簡短段落，由考場、教室、植物園等空間內活動，鋪述學校體制對青年身心的摧殘壓抑，也投射張光直對同儕與學習環境的失望心境。這時期的小說與雜文扣合〈文學是為多數不幸者存在〉所論意旨，以文學積極考察社會各階層的創作目的，表現張光直對左翼意識的肯認。

甫由北京轉學至建國中學的張光直，生活中不斷感受省籍隔閡與教育體制的封閉，而於老師的文藝理論和思想啟蒙下展開社會考察的文學行動，發表創作、演出話劇、編輯刊物並參與文學論戰，展現對社會改造的反封建心志。敘

<sup>28</sup> 張植（張光直），〈老兵的佛像〉，《台灣新生報》，1948年1月19日，第8版。

<sup>29</sup> 張植（張光直），〈伐檀〉，《台灣新生報》，1948年7月5日，第8版。

<sup>30</sup> 張光直自述思想左傾乃受哥哥、徐牧生、溫景昆和羅鐵鷹的影響；左傾思想和郵政檢查黑名單的說法，參見同註14，頁57、51：「有一次在壁報上面我們有人叫他『×駝背』，這是那個學生的外號，叫他的人也沒有什麼惡意，可是他就把我們這一批辦《五十年代》和壁報的幾個人的名字，以我為首，交到訓導處，說是有共匪嫌疑。那時的訓導主任是孫嘉時，很喜歡我，曾經把我的名字交出去，做為每年一次的獎學金的得獎人；這次他拿到名單也例行公事地交給了保安單位，於是我的名字就入了郵政檢查的黑名單。」張光直回憶錄提及的訓導主任孫嘉時，四六事件時他擔任台大訓導分處主任。孫嘉時為外省人，日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中國國民黨黨員，1946年抵台於教育界服務。1948年9月任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生活管理組主任、法學院訓導分處主任等職，1951年出任台大第一知青黨部總幹事。孫氏生平參見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臺大歷史學報》第62期（2018年12月），頁231。

事傳遞現實、製造意義，也建構認同<sup>31</sup>。張光直的回憶錄以個體經歷結合台灣重大歷史事件的實際過程，對自我與戰後台灣進行回顧追溯的敘事理解，從而為自我帶來整合的認同及確認其社會定位的校準。

## （二）創傷推動語言：四六事件的記憶揀擇與邊緣群落

二二八事件之後校園投入運動抗爭者不少，為了鞏固在台統治，1949年起台灣省主席陳誠強勢整頓台灣社會。同年3月間因台大、師院學生單車雙載事件而引發大規模學潮，其後警備司令部出動憲警逮捕抗議學生以整治學風。事件中許多台灣大學和省立師範學院學生因此被捕，張光直是建國中學唯一入獄的學生，入獄原因除了建中在學時期藝文活動和左傾思想問題外，尚受到與北京師大附中友人溫景昆通信所牽連。四六事件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起因與戰後台灣社會政經的發展和國共內戰下學潮相連動。1997年台大成立的「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之總結報告，指出四六事件的發生為學生對國共內戰困局的積極歷史性回應<sup>32</sup>。1949年政府對學生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的「四六事件」，被定調為揭開台灣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以學潮的整肅展開對台灣社會各階層的鎮壓，更造成台灣文學文化的發展陷入停頓。事件後不久政府即發布戒嚴令與懲治叛亂條例，可謂是一影響台灣學界與文藝思潮極其深遠的歷史事件<sup>33</sup>。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所主述的四六事件相關經歷，對於被捕過程、牢友背景、牢獄生活、審訊方式皆有細膩陳述，不失為回視台灣重要歷史事件的文本素材。回憶錄雖然是作者基於個人生命的過往回顧，但因為戰後初期的描述時空，以及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也是常被公眾、他人所提及的過去，事件相關人物的記述透過各式媒介成為台灣重要的社會記憶，或者也能稱為一種集

<sup>31</sup> 蕭阿勤，〈導言 族群化、國族化的政治、文化與情感〉，收於蕭阿勤、汪宏倫等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16年），頁11。

<sup>32</sup> 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11年12月），頁40。

<sup>33</sup> 戰後學生運動與四六事件的興發背景與過程，參見同註32，頁17-41。

體受難記憶。張光直〈四六事件〉一節就其記憶逐一唱名台大、師大、高中與新聞界的十九人被捕名單<sup>34</sup>，並定位這十九人為「受害者」：

但這四十多年存在我記憶裡面只有這十九個人。本文稱這十九人為四六事件的受害者。這十九人都同時在警備司令部的情報處（原日本時代的西本願寺的地窖）初步受訊，然後同時關進台北監獄，同時都在台北監獄一起居住了好幾個月……。所以我這一年的時間是與兩夥人同居最久，一個在台北監獄，一個在西本願寺（筆者註：應為東本願寺），但感情上我是與第一夥人比較認同的。（《蕃薯人的故事》，頁 63-64）

四六事件的逮捕對象不單是學生，更波及新聞界和藝文界異議人士，是治安機關意圖去除不安分子、全面控制台灣社會秩序的開端<sup>35</sup>。四六事件重挫當時校園自由進步的學風，大學校園與民間社會的聯繫開始產生斷裂，為一歷史階段轉型的分水嶺<sup>36</sup>。當局對事件相關人士的監控、追捕更持續至一九五〇年代。引文所述的十九人多是麥浪歌詠隊的台大學生，麥浪歌詠隊的成員主要由當時中國來台的學生組成，與台大學生自治會有密切關係，聯絡了本省、外省學生的情感與文化思想<sup>37</sup>。然張光直認為麥浪歌詠隊的成員不見得都有左翼政治思想，也有單純為了音樂而加入者。

上段引文，恰顯現《蕃薯人的故事》具備集體受難記憶的寫作特性，也不失為另類的社會生態邊緣群落之世相考察。張光直與其他十八位「受害者」的監獄審訊生活，由抵達情報處開始。眾人身體與所處空間皆受嚴格又全面的箝制與壓迫，二十四小時擁擠地躺於無窗室內的榻榻米，受數名配槍士兵監控，

<sup>34</sup> 這十九人名單除作者張光直之外，包括台灣大學的王耀華、周自強、陳錢潮、盧秀如、黃金榮、許冀湯、許華江、申德建、孫志煜、藍世豪、陳琴等 11 人，師大的宋承志、莊輝彰、趙制陽等 3 人，成功中學的丘宏仁，新聞界的史習枚、董佩璜 2 人與背景不明者王輝。參見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的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記》（台北：聯經，1998 年），頁 63。

<sup>35</sup> 陳翠蓮、李鎧揚，〈第四章 四六事件與逮捕行動〉，《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台北：台灣大學，2017 年），頁 89-129。

<sup>36</sup> 歐素瑛指出四六事件之前台灣內外省學生團結、融洽，頗具台灣教育脫離日本教育形式與意識的環境走向。參見同註 32，頁 38-39。

<sup>37</sup> 楊榮慶，〈二二八之後的臺灣大學與學生運動——以四六事件為考察中心〉，《現代臺灣研究》第 5 期（2010 年 10 月），頁 63。

雙手上銬、毛巾蒙眼、如廁、吃飯皆需經人協助。從上可知，張光直的牢獄生活是一場對身心持續的摧殘：

每個人都被手銬銬在前面，手中蒙著眼睛。時間過得很慢，也無法估計日夜。只有大小便時才解開毛巾，看到我們是在一間長方無窗的屋子裏，有榻榻米十張，做二、五的排列。……十個榻榻米上就躺著二十多人，二十四小時蒙著眼睛，躺著地上，由兩三個執槍的士兵看著，一動也不許動。（《蕃薯人的故事》，頁 67-68）

身體作為記憶的一種媒介<sup>38</sup>，張光直藉此深切感受以回憶多年前的牢獄生活。接受審訊的情報處居所空間狹隘逼人外，亦全然不知時間何年何月，每天只能靜默地躺著。來不及或不敢要求士兵協助而失禁便溺，以及時刻暴露於無所不在的凝視目光下的身心監控，令作家以「人間地獄」、「嚇人」形容。移監台北監獄後，苦悶壓迫的牢獄生活才稍獲舒緩。張光直學歌、辦刊物、寫文章、打麻將排遣，過了幾個月他認為有意義的團體生活，與獄友建立良好情誼。不久作家再度回到情報處，過著擁擠壓抑的政治犯生活，期間曾與被捕的國共戰爭解放軍俘虜交談，以及目睹 1949 年山東流亡學生案犯人的慘況：「他們經常是躺在床上的，給我的印象是瘦骨嶙峋的重病者，一個個要掙扎起來的樣子。」（《蕃薯人的故事》，頁 87），尤其突顯威權獨裁體制不分省籍的政治壓迫與緊張時勢。

張光直在 1950 年 3 月獲楊肇嘉力保釋放之前，最後的拘禁地在內湖<sup>39</sup>，此處為 1950 年春所成立的短期過渡教化政治犯的政治集中營，為白色恐怖時期對政治犯進行監管、思想改造的教化單位。張光直敘述內湖此處的空間、活動皆與台北監獄、情報處相異：

<sup>38</sup> 記憶的方式可以借助儀式、空間建築、文獻資料、身體等媒介進行。參見董琦琦，〈第五章 城市身份認同的建構與消解〉，《人文書寫與地緣景觀：20 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北京印象》（北京：學苑，2016 年），頁 223。

<sup>39</sup> 筆者案：應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管轄的新生總隊，另名內湖集中營。

在這裡的生活完全與監獄或情報處不同，而是軍事性的。早上得早起，有早會，要聽大官、小官講演。而且要唱歌。什麼歌呢？國歌、國旗歌、打倒共匪，還有一個新歌叫〈保衛大台灣〉，……我們給送到這裡來，目的是像那位法官說的，是來被「訓練」的。（《蕃薯人的故事》，頁 95-97）

1949 年 11 月發表的〈保衛大台灣〉是台灣第一首反共歌曲，引文所言「訓練」實是思想上的感化改造，聽講、唱歌都是為了灌輸反共思想。張光直於此處待不到兩個月便受釋放，故回憶錄中並無太多描述；然此處也見囚禁的解放軍戰俘接受個別指導，且作家釋放前被營長特別要求簽下立誓保密字據。情報處、台北監獄、新生總隊的種種經歷，足見當局以長期監禁將政治犯與社會隔離外，還以嚴厲且機密的思想改造與身體監控維持執政統治的穩定性。

自 1949 年 4 月至 1950 年 3 月約莫一年的牢獄生活，即四六事件的過去記憶形成張光直個人心理上的一種構圖（schemata），他更自述這一年影響一生做人的態度。作家藉書寫重溯他與事件受害群體互動、對話過程，而建立以往沉默空白的白色恐怖歷史記憶，也勾勒出戰後政治犯的邊緣群落景況：「我看到兩夥人，或說兩夥都包括著好人的人，代表兩種不同的制度，在一個大時代碰在一起，各為其主，各盡其力，彼此相互鬥爭。」（《蕃薯人的故事》，頁 108）。這兩夥人指的是政治犯和政府兩方人馬。回憶錄針對前者群落加以描寫，包含情報處、台北監獄、新生總隊拘禁的四六事件、澎湖七一三軍事冤案、國共戰爭的政治犯與戰俘，特別是當時包括張光直在內因思想左傾而付出代價的青年學子。因此，《蕃薯人的故事》亦具有向所有的時代犧牲者致敬，提供一個回憶和哀悼的話語空間之意義。張光直在回憶錄的族群認知是種在歷史過程中實際操作分類的生活概念，也表現對日本態度的分野是省籍對立的情緒基礎<sup>40</sup>。張光直強調環境對人的影響，或許日後留美的發展選擇也有青年時期受政治迫害

<sup>40</sup> 陳光興，〈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3 期，頁 56。陳光興的討論特別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並非學理上的分析概念，而是一種日常生活中歷史過程的政治建構。所謂外省人其實並沒有共通語言與風俗習慣可於學理上成為獨立範疇，而是相對於本省人的範疇始具有意義。

的創傷使然<sup>41</sup>。可謂戰時北京與戰後返台生活各階段的人物往來與經驗閱歷，呈示了戰後日常中政治認同的建構狀況，另一方面為其日後創作與人格養成的重要框架。

### 三、解構與重述：張光直一九八〇年代小說的創傷書寫

一九八〇年代任教美國的張光直以「吳襄」為筆名及敘事者之名，陸續發表三篇短篇小說，刊行於波士頓旅美華人刊物《秋水》「小人物描寫」專欄。作品依序為小說〈楊老師〉、〈孫在芳〉、〈王恢和李繼禹〉，敘事場景各為美國、上海、台北，正為張光直一生的行跡。「吳襄」一名，論者李零推測或為「無鄉」的諧音，寄託不知家在何處的鄉愁<sup>42</sup>。由文本命名及內容情節而言，生命經驗是張光直寫作取材的來源，他以人物匯集了「社會」，表現特殊時代下人的生存狀態與心理圖像，寄寓歷經戰後政治高壓的文化意識與歷史記憶。打造近代「國家」意識與機制的歷程，通常伴隨歷史傷痛、人民流離、先祖追憶及未來美好想像等條件<sup>43</sup>。張光直不僅以記憶介入過去生活的描寫，也通過書寫強化自己的生命記憶與認同型塑，獲得生命存在的延續性體驗。本節將以一九八〇年代小說對比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剖析作家生命記憶與文學再現間的互文重編，思索創傷書寫如何挪轉為文化批判和自我療癒。

木令耆定位張光直的小說主角是愛國知識分子，這些人同時是日常小人物或一般居民，生活時空為白色恐怖下的台灣，與國共內戰的政治氛圍極為相關：

他的小說內容與當今國共時狀切實有關，但寫的不是政治領導人物，而是關心國事、敢言敢為的愛國知識份子。他們的生活經歷與國共政治空

<sup>41</sup> 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追憶張光直〉，收於三聯書店編，《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北京：三聯，2002年)，頁251。

<sup>42</sup> 李零，〈張光直的精神魅力(代序)〉，收於張光正編，《張光直文學作品集》(台北：海峽學術，2005年)，頁5-6。

<sup>43</sup> 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聯經，2015年)，頁115-116。

氣下產生的患難有唇齒關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深受衝擊，這些是台灣當年白色恐怖下居民的故事。<sup>44</sup>

白色恐怖的壓迫對象不分省籍、年齡、職業，包括知識分子、文化人、軍人、農民、工人。張光直一九八〇年代的小說則明顯鎖定於青年知識分子為主角，以自己所聞的親友經歷、書信為取材，再進行文學改寫或擴編。因此，作品人物角色原型可見於《蕃薯人的故事》，但情節、事件、人物背景細節仍有所出入，這記憶、現實與創作間的落差是亟待討論的問題之一。此外，作者藉敘事者吳襄之口所闡述的弦外之音，也是一待研討的問題。

〈楊老師〉主角名為楊樹芳，是敘事者吳襄的中學國文老師。由人物出身、相識過程、日常軼事、送別地點皆類似於《蕃薯人的故事》所述，推判主角為張光直就讀建中時的國文老師羅鐵鷹。〈楊老師〉由致敘事者的一封來信敘起，這部分對應到羅鐵鷹與其子羅鳴於八〇年代的書信來往，首封來信同樣是老師之子代筆覆信，然信件時間、內容與回憶錄所記差異甚鉅：其一，〈楊老師〉的首封來信融會羅家四封來信的事實內容，簡明交代楊樹芳離台返回西安後被劃成右派的身心殘破現況，且信件最末請託敘事者於美國介紹研究發展的機會，是為了向世界控訴中國的暴行，這是羅氏父子信函從未提及的動機；其二，楊強的信件表露對父親命運的感嘆以及對共產黨統治的怨恨，明確提出 1957 年反右運動的「暴行」，概為張光直小說的增筆；其三，楊樹芳的授課方式、思想談話、行事作風都較回憶錄來得詳細描繪與評價：「他那時是用文藝這個武器來參加革命行列，一心要來摧毀那自《伐檀》以來不斷吃人的舊社會的。」<sup>45</sup>小說呈現的是與回憶錄迥異又鮮明的左翼知識分子形象。

小說的感性層面，〈楊老師〉的敘事情緒於短小篇幅內由失望、震驚轉至回憶往事的感嘆，最後轉化為悲憤與惆悵，扼要呈現張光直這一世代面對弄人時局的心境轉折，卻也於回信字句留下一絲希望：「你的父親戰鬥過了，下面要看

<sup>44</sup> 木令耆，〈再讀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二十一世紀》第 71 期（2002 年 6 月），頁 117。

<sup>45</sup> 張光直，〈楊老師〉，收於張光正編，《張光直文學作品集》（台北：海峽學術，2005 年），頁 31。

你的了。」<sup>46</sup>顯見即便知道在革命路上挫敗的楊樹芳（羅鐵鷹）現況後，處於舊社會的吳襄（張光直）仍未放棄繼續戰鬥的心志，而持以欽羨的態度期待未來，並對下一世代的革命繼續抱以希望。此外，小說敘事者對故人遭遇的感觸及回信，則寄寓張光直埋藏已久的真實心聲：

楊老師自一九五七年來遭受了不少磨難，我很替他痛心，但是我並不覺得他的一生因此便都浪費了。……因為我們都相信我們是在為了一個理想而鬥爭著，並且還相信在這個鬥爭上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而一旦勝利，黑暗便消滅，太陽便上升，天便亮了。楊老師比我還幸福，因為他更進一步地經歷了天亮的過程，而我卻一直停留在舊社會裡面。<sup>47</sup>

敘事者描述 1948、1949 年是這一代青年最興奮的年代，眾人懷著熱忱為社會改造的理想投注心力。楊樹芳幸運的是見到天亮的革命時刻，而人在美國的吳襄內心仍停留於政治未開放的壓迫社會體制中等待。若依楊樹芳之子楊強來信時間一九七〇年和回憶內容判斷，可知張光直借吳襄之口表述對時值戒嚴的故鄉台灣，以及 1948 年熱衷改革的過去自我之繫念。

〈孫在芳〉取材自張光直北京師大第二附小同學管彤芬的故事，《蕃薯人的故事》中〈北京的生活〉僅簡單交接管彤芬的共產黨背景與晚年兩人會面景況。小說則大為擴寫現實中張光直探病至管彤芬病逝的過程，也添述兩人同窗時光諸事及人物行跡，採倒敘法。〈孫在芳〉人物背景由戰時北京改至日本占據下的上海，敘事手法與同期發表的〈楊老師〉一樣，由敘事者收到故友消息的信啟動故事：

這封信的內容，早在預料之中，但消息來到之後，仍不免令人萬分惆悵。……收信以後，孫在芳的兩個影子在我眼前縈迴不去，一個是十二

<sup>46</sup> 同註 45，頁 34。

<sup>47</sup> 同註 45，頁 32。

三歲的小學生，一個是五十上下的患了絕症的病人。從這兩個影子上面，我又恍惚看見了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命運。<sup>48</sup>

這一代中國人指的是青壯年時面臨戰爭與國家分裂的世代，敘事結構以「人」為核心，鋪陳中日戰爭至戰後中國各歷史階段此一世代遭遇。任教美國的敘事者吳襄、遭遇文革折磨的醫師王若英、戰後家破人亡的地下共產黨員孫在芳作為同一世代三個樣本，而以出身複雜的共產黨員孫在芳為中心開展。三人在動盪時勢的考驗過後仍擁有堅強意志，〈孫在芳〉文末同樣構築光明的開放式未來：「謝謝妳帶我去看她，讓我對中國的前途增加了信心。你看，我們三個老同學走的道路真不同；誰的這一輩子是最值得的呢？」<sup>49</sup>而王若英聽完吳襄話後的搖頭與望向孫在芳病房的視線，隱然回應了吳襄最後的提問，身為「中國人」的三人皆因中國付出不同的代價。吳襄此處想法及問題的談述方式，一則藉孫在芳經歷抒發對革命行動者的崇拜，二則批判共產黨、文革、反右運動對昔日同窗磨難的情緒，更多的是留待讀者思辨歷史傷痛的空間。

〈王恢和李繼禹〉則躍出〈楊老師〉、〈孫在芳〉以實際人物為底本的改寫、擴寫模式，進行大篇幅的情節虛構增筆，敘事場景由〈楊老師〉的美國、〈孫在芳〉的上海置換至八月悶熱的台北。出差的敘事者吳襄於離台搭機前細想在台遭遇的人事，憶起參加地下共產黨活動的中學好友王恢和李繼禹。此篇小說部分情節與《蕃薯人的故事》的北京生活內容重疊，王恢潛行至晉察冀邊區參加八路軍革命則又雷同張光直兄長張光正的生平，也摻雜作者北京師大附中同學溫景昆與友人申德建，甚至是羅鐵鷹的經歷。故事背景為三篇最複雜者，憑藉老張、王恢、李繼禹等人的遭遇，串接並重組戰時北京、國共內戰、四六事件、白色恐怖、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對社會、人物的影響。戰爭是引發人口流動最大的動力，楊儒賓定調二十世紀的中國是戰亂與流離的國度，文學文化建立於戰爭流離與苦難之上<sup>50</sup>。戰時氛圍造就四人的民族認同與政治傾向，四個中學同窗的命運轉折繫之於國共內戰的爆發。先後來台的老張、吳襄於學術界發展順

<sup>48</sup> 張光直，〈孫在芳〉，張光正編，《張光直文學作品集》（台北：海峽學術，2005年），頁35。

<sup>49</sup> 同註48，頁41。

<sup>50</sup> 楊儒賓，《1949 禮讚》（台北：聯經，2015年），頁75-76。

遂，活動派的王恢、李繼禹成為地下共產黨員後，各於台灣、中國備受政治及時局磨難，兩組人物形象、景況形成鮮明對比。

王恢的兩次出場都在吳襄的訪台回憶中，戰後初期吳襄曾與化名趙大成的王恢巧遇，卻因四六事件王恢被判為左翼學生入獄，而錯過會面約定；兩人再次相會已是八〇年代，但王恢已精神消沉、衣衫襤褸且左腿瘸拐，以擺攤算命為生：

以王恢與我交情，應當把他留下來，代他安頓一下。可次看他神氣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種厭惡的感覺，而且覺得他我之間這幾十年的距離恐怕已經成為一個不可超越的鴻溝了。……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台北喝酒醉倒，不省人事。<sup>51</sup>

吳襄訝異的不僅是光明親切的王恢成了消沉卑猥的算命先生，吳襄更對之感到厭惡而保持距離，會面後的買醉呈現的盡是悲痛感。從 1946 年至八〇年代間只知王恢輾轉於台北、內湖、綠島長期關押，故事雖無從得知究竟發生什麼，卻確見王恢精神與性格上的沉淪和黑化。此處為張光直對台灣白色恐怖的未竟之筆，寄寓己身為四六事件搓磨的深沉創傷，帶出戰後政府高壓統治下人民的集體傷痛。

因戰後中國、台灣隔海對峙、互不往來的時代限制，敘事者至一九八〇年代才得於北京與李繼禹會面。然而如同〈楊老師〉的楊樹芳和〈孫在芳〉的王若英一樣，李繼禹在戰後中國飽受文革的身心折磨：「你走了以後我在地下黨中工作的時候，倒是沒有想到我有一朝也會成為革命的對象的。這真是一場噩夢；可是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噩夢，是全國的噩夢。」<sup>52</sup>文革如全國人民持續了十年的惡夢，耗損了李繼禹十年的生命時光，精神擾於不了解自己為何被劃為黑五類的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張光直將八〇年代王恢的形象置李繼禹之後描述，使李繼禹與王恢的人生波折架構出另一組對比：相對於李繼禹抱著殘缺身體持

<sup>51</sup> 張光直，〈王恢和李繼禹〉，收於張光正編，《張光直文學作品集》（台北：海峽學術，2005年），頁 50。

<sup>52</sup> 楊儒賓，《1949 禮讚》（台北：聯經，2015 年），頁 47。

續前行，在台灣活動的王恢已全然崩潰、苟且求活，甚至偷竊昔日故友的財物。若言中國文革是一場李繼禹已走出的惡夢，迄八〇年代初仍戒嚴的台灣則是王恢持續的惡夢，無法抹去的創傷。王恢的現況對比吳襄對戰後台灣高度經濟發展的觀察，更顯唏噓：「乍到台北，看見那商店中各種奢侈消費品堆積如山，路上計程車和私家汽車如水如龍連接不絕，心中又覺興奮，又覺悲痛。」<sup>53</sup>甫由中國抵台的吳襄雖對此景況振奮，但由戰後初期到七、八〇年代經濟起飛發展的社會是如何走來，箇中過程又令他感觸良多。

自戰後初期睽違三十多年的小說創作，海外的張光直收束自身周圍遭受國家暴力的受難者集體創傷，展開言說及自我審視的行動，運用記憶作為一種抵抗的政治，應和了一九八〇年代起海外台灣人愈加關注二二八事件與國族問題的聲浪<sup>54</sup>。是故，三篇小說都出現了敘事者的詰問，此技法除了與小說人物對話、推進情節，也蘊含向讀者發聲的批判力道。這力道尤見於〈王恢和李繼禹〉最末引述的專欄文章〈對旅美學人的兩點忠告〉，內容犀利提出旅美學人對國家發展應持的貢獻態度，以及所應認同的國家民族。此篇引文直接批判旅美學人社群避居海外的高姿態，與徘徊中國、台灣之間曖昧不清的認同問題。上述論點若對應張光直的生命經歷，可謂是相當針對性的自我省視及評判。敘事者吳襄看完此文，也無法置喙：「我苦笑了一聲，提起沉重的行李，向著『出境』的箭頭蹣跚走去。」<sup>55</sup>苦笑、沉重、蹣跚的感官和情緒形容，再加特以引號標示的「出境」二字，莫不潛藏張光直對過去及現在的我，甚至是向同一世代最深刻的探問；亦呼應敘事者「吳襄」一名鄉關何處的意涵。由此可知，張光直的小說除了再現歷史創傷經歷，亦顯現流離經驗與創傷記憶對個人及其文化身分遲發作用的省思<sup>56</sup>。

<sup>53</sup> 同註 51，頁 47。

<sup>54</sup> 1948 至 1983 年間二二八事件相關資料幾乎不見於公共輿論空間，直至 1987 年台灣方出現較多報導，一九八〇年代海外華人對二二八的關注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討論，則促使國民黨政府展開二二八論述的族群操作。而陳翠蓮認為二二八事件的正義轉型，族群議題始終被官方工具性的掩蓋專制政權對人民暴力統治的問題核心。陳翠蓮，〈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6 期（2008 年 6 月），頁 191-199、211-213。

<sup>55</sup> 同註 51，頁 53。

<sup>56</sup> 「遲發作用」意為被抑制的記憶或意識裡被排除的記憶在一段時間延緩後，再以某種形

張光直回憶錄與小說的特殊處在於小說創作在先，回憶錄在後，小說雖由回憶錄追溯可知是以真實人物為底本，情節卻皆大幅改寫或擴寫人物經歷與時空背景。作者藉由人物的身心創傷批判中國文革、反右運動、台灣白色恐怖等國家暴力，回應了一九八〇年代以降文革過後中國的文化反思思潮，以及海外台人崛起的國族意識思辨，且影射小說出版時空的台灣戒嚴為持續的惡夢。晚年小說中這些鮮明左翼知識分子的形象與失落，隱然表露了張光直青年時期的「左翼」傾向與政治受難經驗。作家以生命經驗揭露與重述小說〈楊老師〉、〈孫在芳〉，展開歷史暴力的解構與創傷記憶的自我修復。這種解構性更顯見於〈王恢和李繼禹〉裡敘事者對身為旅美華僑的自己的反身詰問，亦是張光直對旅美多年的自己的積極省視；此外，若言小說突顯在美離散經驗對集體創傷記憶書寫的觸發，《蕃薯人的故事》所述之二二八事件中不得其所的尷尬與四六事件入獄經歷，則屬作家有意識地梳理創傷記憶之後，所形成的修補與矯正行動，而於九〇年代台灣族群政治加溫的背景，呈現張光直與其中國、台灣經驗的主體認同辯證。

綜觀這三篇小說，故事都於特定歷史的政治傷痛背景之上推進，回溯過去記憶突顯人物今昔變化與多舛命運，或是遭逢戰後共產黨反右、文革，或是國民黨獨裁威權體制的政治浩劫。換言之，專制政權對人民暴力統治的政治壓迫，是張光直小說裡巨大且反覆出現的心理創傷與故事背景，經過他有意識的情節整理、刪改與加筆，將個人創傷經驗轉換成集體傷痛敘事。人物所承受的不單是身體殘缺，還有無法忘卻、永無止盡的精神失落和自我拷問；然各篇晦暗的敘事線仍留下一絲希望，對下一世代的社會改造持以希望，張光直對小說未來圖景的安排是就過去記憶的續寫及反寫。承前所述，一九八〇年代初這些融合個人生命經歷，以述說文化、意識型態與歷史衝突的記憶，正是作為海外華僑的張光直辯證個人於戰後混亂危機中身分認同的具體行動。由小說創作和後發

---

式表達而出的現象。文學表現為由再現事件轉為暗喻創傷遲發的病態和影響，且創傷反應受到個人心理歷史、記憶、想像，以及創傷發生當下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所影響，故文學文本呈現的是創傷對個人和文化身分的持續影響，而非特定事件的感知。參見史艾米（Imy Schweiger），〈創傷歷史與集體記憶——作為交流型記憶和文化記憶的文學〉，《清華中文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298。

的回憶錄，呈現張光直面對台灣世代文化記憶斷裂的焦慮，也持續摸索自身經歷的意義和社會定位。不能忽視的是〈楊老師〉、〈孫在芳〉、〈王恢和李繼禹〉三篇小說人物的缺席或失蹤情節，及其再會後景況今昔落差對敘事者所引發的持續創傷狀態。他以政治受害者的邊緣故事勾勒出中國、台灣社會特殊氛圍與生活格局，及其連動構築的人際關係。如此創作脈絡不僅鋪墊張光直九〇年代回憶錄所述的文化關懷，也提供戰後社會與生活其中的「人」之記述。

#### 四、結論：歷史縱深中的自我探問

1945年終戰帶來的變化不單是國籍改變、領土重整與人民的再國民化，強權環繞的地緣競爭以及多重殖民歷史背景，加諸語言的多樣性和文化的混雜性讓台灣人的身分認同邊界彼此交錯，無法以地域、主權界定。1946年底返台的張光直初次踏上父親故土，即親身面對上述時代背景以及接踵而來的政治事件，可想其衝擊。鄉土感源自熟悉，對青年張光直而言北京、台灣二者，前者是生活十多年且具有文化情感的熟悉空間，後者則是陌生且遙遠的世界。台灣之於他既是鄉土又是異鄉，當作家還在學習適應新家園的階段，二二八與四六事件的經歷卻隨即帶來負面情感經驗和身心磨損，以及奠定其一生志在探究人類之本質和文明的正向意念。記憶並非單純的心智意識活動，而於文學文化生產中隱含政治、社會與文化意義<sup>57</sup>。張光直的回憶錄與戰後初期、一九八〇年代的創作皆可視為一種社會回憶活動的反思，亦呈現台灣經驗對他所造成的必須透過書寫表達意念的焦慮來源；另一方面，這些創傷書寫呈示了歷經終戰前後北京、台灣生活的台灣知識分子，是如何處理個體之生命創傷與歷史記憶的思維脈絡。

掌握戰後張光直的歷史記憶與重寫，等同窺見歷經戰後初期此一過渡階段的台人心靈圖像與認同崩解，故有了返觀戰後台灣的積極性省思。《蕃薯人的故事》對戰後台灣族群融合、政治迫害的經歷描述，一則可視為對過去歷史事件的客觀理解，一則可視為歷史創傷的主體闡釋：作為歷史事件，上述經歷有其

<sup>57</sup> 李有成，《記憶政治》（高雄：中山大學，2020年），頁63。

發生的特定時空，敘述戰後台灣種種一如張光直所言「再不寫，恐怕這一小段歷史就沒有人記得了」（《蕃薯人的故事》，頁 105），是為了回到歷史過去以記錄史實、追悼人物；作為歷史創傷，戰後國族統合過程中所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則為張光直融合個人政治受難經驗下文學寫作的探問議題。藉由主觀生命記憶與客觀歷史事件的選取與撰寫，將之組織成有意義的故事情節，以回顧個人生命的發展歷程，甚而省視戰後台灣國族認同重構的大敘事。創傷書寫是成就文學與歷史的一種方式，透過斷裂、破碎的歷史記憶之重組，構築國族歷史與文化傳承的重要情節<sup>58</sup>。歷史創傷寫入了回憶錄和小說敘事，讓未曾經歷該事件的人得以觀看這些事件的細節。因此，《蕃薯人的故事》敘事意義不再停留於過去史實的挖掘，而是國族歷史敘述與傳衍層次上社會記憶、社會公義的價值闡述，以及張光直對過往左翼知識分子之自我的哀悼。

戰後初期張光直的文學活動表現了左翼意識的社會改造異見，以及時局變革的敏銳感知。在張光直自我闡述、修復和凝視的文字路徑中，即一九八〇年代小說至九〇年代末葉回憶錄的著述，其創作進路從政治受難群落的側面描寫，乃至正視個人的創傷經歷和歷史苦難，藉歷史縱深的探究以整合集體記憶與個人身分認同。尤其站在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政治氛圍開始鬆動，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處於轉型階段，此際張光直以歷史記憶與民族創傷的母題，展現終戰以降中國、台灣兩地知識分子思想意識與認同情感上的混雜與痛苦；1998 年的回憶錄接續記錄了觸發戰後省籍衝突與高壓政治的二二八事件與四六事件，架構出中國與台灣認同疊合的衝突及內在崩解。八〇年代小說的對話對象為旅美離散的華人群體，九〇年代末的回憶錄則於族群政治衝突加劇的時代浪尖上省視個人記憶。張光直藉由書寫從而抽身觀看創傷，感知除了痛苦的主體之外，還有另一個有能力逸離且更具力量的自我存在。除開前述文化傳遞與歷史銜接的轉型正義，人之於人的價值認識上的平等感與精神聯繫也是張光直創傷書寫的意義，個人意義上則是作家以文學與父土台灣聯繫的重建。

<sup>58</sup> 黃心雅，〈創傷與文學書寫〉，《英美文學評論》第 20 期（2012 年 6 月），頁 VI。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三聯書店編，《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北京：三聯，2002年）。
- 何標（張光正），《明月多應在故鄉》（台北：海峽學術，2008年）。
- 李有成，《記憶政治》（高雄：中山大學，2020年）。
- 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新北：稻鄉，2007年）。
- 孫康宜，《走出白色恐怖》（台北：允晨，2007年）。
- 張光正，《番薯藤繫兩岸情》（台北：海峽學術，2003年）。
- 張光正編，《張光直文學作品集》（台北：海峽學術，2005年）。
-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的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記》（台北：聯經，1998年）。
- 許毓良，《台灣在民國：1945~1949年中國大陸期刊與雜誌的台灣報導》（台北：前衛，2018年）。
- 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
- 陳翠蓮、李鎧揚，《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台北：台灣大學，2017年）。
- 曾健民編，《噤啞的論爭》（台北：人間，1999年）。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年）。
- 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聯經，2015年）。
- 董琦琦，《人文書寫與地緣景觀：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北京印象》（北京：學苑，2016年）。
- 蕭阿勤、汪宏倫等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16年）。

謝政論等編，《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台北：允晨，2015年）。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台中：晨星，2000年）。

藍博洲，《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臺大部分）》（台中：晨星，2001年）。

藍博洲，《台灣學運報告 1945-1949》（台北：印刻，2015年）。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丸川哲史著，朱惠足譯，〈與殖民地記憶／亡魂之搏鬥——台灣的後殖民心理地圖〉，《中外文學》31卷10期（2003年3月），頁29-42。

木令耆，〈再讀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二十一世紀》第71期（2002年6月），頁117-119。

王甫昌，〈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〇年代臺灣的族群政治〉，《臺灣社會學研究》第2期（1998年7月），頁1-45。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卷3期（1996年9月），頁147-184。

史艾米（Irmy Schweiger），〈創傷歷史與集體記憶——作為交流型記憶和文化記憶的文學〉，《清華中文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283-310。

江玉林，〈人、法的主體與法律的考古：從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也談法律的故事〉，《月旦法學教室》第12期（2003年10月），頁110-120。

翁奕波，〈異鄉人變奏曲——木令耆小說創作簡論〉，《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2年7月），頁41-46。

高友德、劉益昌、陳其南，〈鋤頭下的學問：初訪張光直〉，《當代》第16期（1987年8月），頁91-105。

- 崔末順，〈「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1 期（2015 年 10 月），頁 39-69。
- 許雪姬，〈1937 年至 1947 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 卷 1 期（2008 年 4 月），頁 33-84。
- 陳光興，〈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3 期（2001 年 9 月），頁 41-110。
- 陳翠蓮，〈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6 期（2008 年 6 月）頁 179-222。
- 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臺大歷史學報》第 62 期（2018 年 12 月），頁 213-265。
- 黃心雅，〈創傷與文學書寫〉，《英美文學評論》第 20 期（2012 年 6 月），頁 V-XI。
- 楊榮慶，〈二二八之後的臺灣大學與學生運動——以四六事件為考察中心〉，《現代臺灣研究》第 5 期（2010 年 10 月），頁 60-67。
- 臧振華，〈張光直生平事略〉，《古今論衡》第 6 期（2001 年 6 月），頁 106-110。
- 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臺灣學研究》第 12 期（2011 年 12 月），頁 17-41。
- 羅詩雲，〈擬聲政治：論戰後初期《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淡江中文學報》第 41 期（2019 年 12 月），頁 215-242。

### 三、報紙文章

- 何無感（張光直），〈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台灣新生報》，1948 年 8 月 25 日，第 4 版。
- 張植（張光直），〈老兵的佛像〉，《台灣新生報》，1948 年 1 月 19 日，第 8 版。
- 張植（張光直），〈伐檀〉，《台灣新生報》，1948 年 7 月 5 日，第 8 版。